

●多声道

比较文学走向总体研究之我见

萧兵

希罗多德的《历史》记载,中亚地区有一种“独眼人种”叫做“阿里玛斯波伊”(Arimaspea),现在历史学界逐渐承认它就是中国《山海经》里的“一目国”,是对游牧民族的一种“曲解”。我们在《中国文化的精英》和《山海经的文化寻踪》里反复论证它跟荷马史诗里吃人的“独目巨人”本质上是一回事。郎樱等的个案研究证明,这个故事或母题几乎遍布中亚—西域各个重要民族。并一直延伸到北亚和东北亚。防风氏“连眉而一目”,也属于“独目人”(西亚某些造像双眉连接在一起,维吾尔族等至今以“连眉”为美)。

更加奇妙的是,吃人的“独目”牧羊人,为被俘的英雄刺中额间独目,英雄用巧计混在羊群里逃出洞穴的故事,不但以“改型”零星地保存在中国文献里,而且还完整地保存在云南普米族的民间传说之中。

再加上近几十年考古人类学证实,先秦时期的“西域”,中国的新疆地区,居住的主要是白皮肤的“原始欧洲人种”或其分支;而安阳殷墟妇好墓(mǎo)出土的美玉几乎全部来自和田,春秋战国前后的“料器”或类玻璃制品等,也是东西文化交流的物证。专家们还证明,阿尔泰地区约当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巴泽雷克大墓出土中原作风的文物,特别是跟江陵楚墓丝绸凤鸟图案完全一致的刺绣纹样,多角星形的“生命果”,更是从西亚到东亚都常见的艺术母题。

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先秦时期,远在张骞通西域或“丝绸之路”开辟以前,中国与西亚乃至欧洲在“因子”水平上的文化碰触与交流,已是无需赘言的事实。逐渐热闹起来的“草原之路”或“前丝绸之路”的跨学科研究与跨文化对话,再也不是、也不应该是“猜测”或“推论”。

有一位世界史家指出,十九、二十世纪的“进化论”把人类的历史变成一个有序系列,“比较语言学”,特别是“比较神话学”则把全世界的人类化为有机的整体。那么,二十一世纪的科学,逐渐“合流”的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就更加应该是跨文化、跨语种、跨洲界的“总体科学”——它面对的必然是作为有机而又有序的“整体”的人类及其“宇宙”(宇宙也可指宇宙万物)。至少,比较性的人文科学或文化科学,其对象必然是“人类”,必然是建立在全球化经济与总体化文化、多元化文化基础之上的“地球村”。这就是说,“比较文学”走向文化研究、走向总体研究,走向人类研究,已是不可逆的“进程”。所谓古典学派、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与所谓现代学派、美国学派的“无影响研究”,必须有机地结合起来;新世纪最有前途,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危机”的将是超越“后现代”的综合研究、总体研究。

就在上述的“事实”与“理论”的背景之前,我们几个以中国上古文化研究为对象的中青年学人,企图借鉴乾嘉学派的文字训诂考据方法,企图在新的层次或水平上复兴古典学派、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建构我们实证性的“文学人类学”;希望能够利用较新的人类学理论、材料与方法对中国先秦两汉时期最有影响的几部“元典”,诸如《易经》、《尚书》、《诗经》、《楚辞》、《论语》、《老子》、《庄子》、《山海经》以及《史记》、《说文解字》等等,进行现代性的诠释或“破译”(现已出版七种)。

我们觉得,这是一种实证性的总体研究,也必定是一种跨越性的比较研究。作为一个“高度进化”物种的人类,能够创造工具与文化、能够进行理性思维并且使用意义分明的音节语言来对话的人类,肯定有共同性的身体构造、心理构造、语言构造——我们常

说,各民族是有“共同语言”的,人类学称之为“元语言”,经过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等学派的努力,已经发现了它的若干基本结构或“模式”;有人称之为“元语法”,或曰“故事下面的故事”。比如,保存在各民族神话传说宗教民俗或文学作品里对死亡的恐惧和关怀,对生命的热爱与渴求,往往凝铸为“复活”或“长生”的“幻想”,或者说凝铸为“生——死——再生”的“永恒回归”(eternal return)的思维范式,并且将它与太阳的升降、季节的转换、植物的盛衰等等联系起来、整合起来……这在几乎所有世界性的“元典”或经典文学作品里都有它的不同“表现”,不同“形样”(form),不同构造。我们完全可以借助“元语言”及其原型模式的破解与推绎功能将其寻找出来,再现出来——这也是我们对上述几部中国“元典”所做的“破译”的最重要尝试。我们觉得,各国的学者应该一起努力来进行这项基础性的系统工程,这样“跨文化对话”才有历史基础,才有理论前提,才有现实可能,才有具体成绩可言。

这项工作不但命定地是“跨文化”,而且是“跨学科”的。从前文大体已可看出,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和文化学的“共同参与”,是首要和必不可少的。例如,人类当然有它的“共同祖先”,那么必然有它的“共同语言”(或母语),这不但是思维—文化心理性的“元语言”,而且是“原语言”。这项研究在旧世纪,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至少也是“不可期”的。然而,“地球村”已有自己目前最好的对话工具:电脑及其互联网。各民族、各学科的学者的“协同”配合计算分析与交流,在二十一世纪也许会带来一些新的成绩。例如,上一世纪下半叶,中西学者对“汉藏语系”的共同母语与原始汉语的构拟与推测就有了一些进展,这是个很好的“准备”或“基础”。所谓“诺思替拉”(Nostriatic)假说——试图建立亚欧板块、甚至亚非欧板块的庞大语系——并不成功,但是确实有些生物名称、族团名称、人神名称奇异地相似。仅就我们所涉的民俗神话而言,“寿麻”与印度的“soma”的趋同,跟“苏美尔”(Sumer)的相似就耐人寻味;它还涉及 Shaman(巫师)/沙门(修行者)等名称的

来源。“混沌”(chaos)神话是各大民族都共有的,只有形态不同;而“混沌:昆仑(混论):鸿鹭:葫芦”的读音跟梵语 kala(黑)难说没有关系。这样,语言人类学就必然进入更加微观而又高度宏观的领域,电脑和互联网将提供更多的资讯并做出初级的比较与抉择,而不像我们仅仅依靠极为艰难的手工搜索、田野记录和翻译介绍。届时,不但同语族、同语系的基本词汇表可以轻易获得,世界性的语词、语音历史比较表将更大地开拓我们的思维与视野。比较文化、比较文学才能真正建立在坚实可靠的“比较语言学”的基础上。

同样,体质人类学也将深入人类的饮食结构、环境结构,直到基因结构,而不再停留在活体或遗骨的形态观察测量鉴定之上,从而为建立“基因人类学”或“基因文化学”之类准备实验与实证的条件。“考古人类学”将更多地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与技术,航空(或航天)考古、水下考古、深地考古将更大开展,时间测定可能达到月/日/时,而不是像目前的 C₁₄、树轮校正、热释光测定那样只能确定年限,还有误差或正负值。这一切都使得“人类学”成为真正“全人类:全世界”的科学,传统的文化人类学或文学人类学面临“更多的机遇”和“更大的挑战”,不得不去深入更加恢廓的宏观世界和更加精致的微观世界。与其相邻的“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恐怕也不仅要“走向世界,回归文学”(或回归文化),而且将有更大的震荡、变革与整合——分工愈细,联系愈广,分析与综合的辩证统一,本来就是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向。

我认为:历史向我们表明,无论何时只要有新的文化形式出现,它们总是不同文化传统相互作用的结果,总是不同文明互动的产物,它们得自于文明的联袂、混合、杂糅,甚至是不同渊源的成分的杂交。

——〔法〕施舟人《文化基因库:对于人文科学功能的反思》,摘自《跨文化对话》第二辑